

中共的危機與出路

黃城

前言

對於即將舉行第十一屆六中全會的中共而言，目前正處於歷史鉅變的漩渦裏，它正接受著中國歷史與人民的最終裁判；並且，中共政權本身也正面臨著思想路線、組織路線與政策路線等各方面的危機。這些危機具體地表現在那些地方呢？其本質何在？與中國前途之關係如何？要怎樣才能化解其危機呢？何處是中共真正的出路？本文將依序探討這些問題。

壹、中共目前面臨的危機

中共成立於六十年前，而於三十二年前竊據中國大陸。數十年來，它一直在變。變是歷史發展的現象，不足為奇，惟對於奉行馬克斯唯物史觀的中共言，這數十年來的變，却蘊含一極大之諷刺，因為它的變，並不照馬克斯所言，從社會的下層結構——經濟出發，相反地，它的變總是從思想、政治的領域出發；而每一次的變，都是逆歷史之常道，悖人性之情理，因此，都帶來極大之災害與危機。

構成中共目前危機，除掉本質上的因素外，有幾個直接的序幕曲，我們要先加以瞭解：

(一) 民國六十五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大匪酋，先後逝世，使中共權力結構起絕大變化，一時間，各路人馬劍拔弩張，形成權力鬥爭之基本態勢。

(二) 華國鋒以一時之機緣，兼掌黨、政、軍三方面大權，然論其個人之資歷、威望與能力，則顯然不足以成氣候，因此使中共內部權力結構失去平衡，註定要引發一場空前的歷史大風暴。

(三) 鄧小平的三下三上，固然代表了文革受害者的復仇形象，但又何嘗不是象徵著中共內部權力傾軋的了無止境。

(四) 四人幫的被捕與審判，是中共內部奪權鬥爭的另一種形式之開始，它揭穿了毛澤東思想的神話，暴露了大陸人民與共產黨徒之間，尖銳對立的真象；並且，告訴世人中共無法無天的事實。

由於這一連串事故的開展，遂使本來已經癱瘓、混亂的中共偽政權，形成下列各方面的危機：

(一)美俄爭霸下的尷尬國際處境：中共為蘇俄扶植之傀儡，本無獨立自主之國際人格可言，尤其在一面倒向蘇俄時期，更是如此。不過，後來雙方反目，中共在國際社會上，遂處於閉關自守的局面；到「乒乓外交」之後，近十年來，中共又一反舊態，積極在國際間活動，企圖扮演一強大、主動之角色，以突破其外交困境，並達孤立我自由中國之目的。但在當前美、俄兩超級強權爭霸之際，中共實力既差人家一大截，蘇聯又在邊界陳兵百萬，並拉攏越共、印度，入侵阿富汗，對中共形成封豕長蛇之勢，誠如鄧小平言：「對付蘇俄的擴張主義，只有一個方法——不是投降就是戰爭」^①，中共不肯投降，又不敢戰爭，所以，遂聯結美國，想要玩權力均衡的遊戲。然而，美國與中共，在長遠的戰略目標上，祇有「分別而平行」(Separate but parallel)的利益，却無共同的焦點，因此，彼此愈接近，勢必愈「增美俄關係的緊張，加深冷戰的危機」^②；中共想在火中取栗，必難免於引火自焚。近日中共又叫囂要「懲罰」越共，正是其國際處境日趨險惡之表態。

(二)思想路線的「三信危機」：在馬克斯理論中，賦予思想意識型態「上層建築」的地位，但對每一個共產政權而言，意識型態却始終發揮著「下層建築」的作用，它是整個政權體制的最高價值根據，也是一切集體性政策、規劃與個別性思想、行為的指導原則。所以，「中共在過去三十年來，一直進行著一種『意識型態的工程』(Ideological Engineering)，旨在模塑人們的信仰系統、價值規範，並把這個『工程』看做是建造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基石」^③。然而，經過四人幫的審判，以及文革大翻案之後，由於眾多中共政權的黑幕，漸為人民熟知，再加上中共繼續空喊口號，毫無解決人民生活的辦法，遂引起全面性的「三信危機」：即對社會主義制度、馬列毛思想失去信仰、對共產黨領導失去信任，以及對四個現代化失去信心。更嚴重的是，由於「三信危機」，使大陸同胞普遍著冷漠與觀望的態度，這對於中共政權的延續，是一極大的威脅；又對於中共任何革新的企圖，給予根本上的否定，可說是中共最大的危機。

(三)經濟生產停滯不前：共產主義原以解決人類經濟問題為重心，亦以此最能吸引貧窮國家之嗜試。可是，中共統治大陸三十二年之後，不要說「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還遙遙無期，即使維持人民生活的溫飽，亦大成問題；其中原因自然很多，如人口成長率太高、教育部門未能提供適量人才、市場價格功能的喪失、經濟計劃的失調等均是。但更根本的說，毋寧是共產主義經濟學，完全漠視生產誘因與缺乏經濟心理學的基礎所致；而中共又變本加厲，以過度的政治鬥爭，經常破壞生產活動，且透過政治成分所決定的經濟再分配，也違背公平、公開、合理的原則。所以，中共目前的經濟危機，首在人民缺乏生產意願，個體生產能力太低，社會的總體生產量偏低；次則在大規模失業的出現，致每年有二千萬人待就業；三是通貨膨脹激烈，貨幣發行量大增，使人民生活計愈趨困難；四是財政收支赤字，一九八

○年已達八十億人民幣，往後勢必有增無已。總而言之，中共雖誇稱共產經濟制度有諸多優點，但實踐的結果，却證明其負面作用遠大於正面作用，已造成「貧而不均」的經濟危機局勢。

(四)道德法律蕩然無存：中國是一倫理本位的社會，以道德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自然力量，而以法律為維持社會秩序的人為力量，兩者原不可偏廢。中共早在民國二十九年時，即由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口號，以消滅舊傳統、舊道德為手段，為建設「共產主義的天堂」鋪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提出破四舊、立四新的名詞，因此，一切美好的傳統文化，都帶有原罪、封建的色彩，而被棄之如敝屣了。再加上毛澤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作風，使得中共在法制方面，有很多地方比他們所攻擊的傳統法制更專橫、更殘酷、更不公平。因此，現在的中國大陸，事實上是一個道德、法律蕩然無存的黑暗社會，人際關係既無一明確之準則可循，則伴隨人際關係所展開的各種社會活動，就更紊亂無章了；所大行其道的是乖張的獸性與無孔不入的特權，而這與現代社會的來臨，恰好南轅北轍。中共有鑑於此嚴重危機，最近遂大力倡導精神文明，展開「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與「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等所謂「五講」、「四美」的運動；究其實，即為挽救大陸上道德法律蕩然無存的社會危機。

(五)教育文化一片空白：中共在文化上是一極端主義者，此與中庸調和的中國文化，本來根脈不同，因此，它的文化發展，必然會引起中國文化的強烈迴應。而它又緊緊抓住教育這一環，認為它是革除舊文化、建設「新中國」的工具。經過三十二年的統治，特別是文革十二年，使得全大陸的中學、大學教育完全停頓，造成知識發展上的一段空白；同時，在各個文化領域裏，無論文學、藝術、戲劇等各方面，因為「欽定路線」搖擺不定，創作研究，動輒得咎，可以說也是交了一片空白。時至今日，雖然恢復了中學、大學的課程，並派大批留學生出國，但整個教育風氣仍在待復之中；至於文化方面，因為極端主義的性格並未消失，所以，依然不能忍受有個性、有創造的東西出現。目前中共正在圍剿的「苦戀」作者白樺指控說：現在「大多數知識分子根據切身體會得到的教訓是：當允許你放的時候，就潛伏著收的危機；當你放的時候就為自己挨打，掙一頂帽子、坐牢準備了條件」④，適切說明了大陸的文化工作者之心境。而教育的失敗，是四個現代化不能成功的根源，文化的空白，更沒法引導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六)幹部的腐化無能：依照列寧「職業革命家」(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y)的構想，幹部是構成一個共產政權的中堅力量，在未取得政權時，幹部們發揮滲透、顛覆、奪權的效用，在取得政權後，幹部們則發揮統治、鞏固、監督的功能；中共即充份履行此一構想。但時代演變至今，大批的中共幹部，形成既得利益階級，所謂「絕對的權力變為絕對的腐化」逐漸在他們身上呈現，而中共內部却無法清除這些「革命隊伍中的渣滓」，以致讓他們坐大，妨礙到整個行政系統的機能。再者，衆多中共幹部中，有不少是因緣時會進去的，

他們往往「紅而不專」，僅有的一點知識，既不足以領導「科學的群眾」時代，且又專橫驕跋，不可一世。他們在中共歷史上可能確有汗馬功勞，但就目前而言，却是中共政權最大的負擔。這樣的幹部，不要說行政效率之低，最嚴重的是，由於他們的作爲，使大陸同胞對中共偽政權，更加不滿，更加不敢對其有所信任。

上述六點，就是中共目前面臨的危機之總說明。

貳、剖析中共危機的本質

面對中共這些危機，我們追本溯源，可以發覺：這些危機並非一時的現象，而是跟整個共產主義的思想與制度，有著本質上的關聯。試論述如左：

一、共產主義的臭汗衫

共產主義是「西方的反西方」思想之極端表現，關於它的總評價，可以用荀子的話來說：「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⑤，共產主義就是那愚者。所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稱它的創始者馬克斯爲「社會病理學家」，真是一語定論。從知識社會學的立場言，我們可以說共產主義是一種封閉性的意識型態，這種意識型態的最大特點是，一旦它形成之後，就不太容易經由自我的反省與努力，而對現存意識體系有所超越與突破；尤其當一個政治社會一旦變成共產主義的體制後，更不容易轉化成另一種型態，試看「蘇聯已經實行共產主義六十多年了，有很多理由它應該變，實際上它還是繼續維持下去，中共儘管在意理鬥爭的路線方面變來變去，但是，還沒有超過列寧式或史大林式的共產主義的路線」^⑥。因爲始終頂著共產主義這件臭汗衫，使中共黨內無法出現真正的改革與進步，一部中共黨史，祇是權力鬥爭的重複表演而已，它既難對現存問題，作根本而有效的解決，便讓這些問題愈桶愈大，終於在毛澤東死後，不到五年之間，演出好幾幕激烈的權力鬥爭，而釀就目前的危機。

二、毛澤東思想的邪惡性質

毛澤東自認爲「有三本書對我的思想影響特別大，使我對馬克斯主義建立起完全的信仰，接受馬克斯主義是歷史的最正確解釋之後，從沒有動搖。這三本書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和克卡樸（K. Kirkup）著『社會主義史』（History of Socialism）」^⑦，可知其信仰之淺薄；而他實際是一個帝王主義、英雄主義與流寇主義三者的結合體，爲了他個人的權

力慾望，不惜「運用這種把人民劃分成不同的『想像中的』利益集團的方法，使他們認不清自己真正的利益的所在，去爲了並非他們自己利益而且危害他們自己利益的目標自相殘殺」^⑧，毛澤東正是因此才使得億萬受他壓迫受他玩弄的人民擁護他，他才得以把他劊子手的面孔裝扮成人民領袖與救主的面孔。由這樣的人來控制中共這個龐大的黨數十年，他們所造成的災害便罄竹難書了。中共目前雖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有異常矛盾的說法，即認爲毛澤東「開國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事實上，並沒有把毛澤東思想中極權、專制、殘暴、恐怖的性質顯露出來。而這樣的毛澤東思想之餘毒，正是造成中共目前危機的另一重大根源。

三、新統治階級的腐化作爲

中共政權主要由中西兩股歷史力量滙湊而成：「一是明清以來惡化了的皇權傳統，一是近代西方傳來的極權的政黨組織。前者構成其思想的實質，後者提供了權力的結構」^⑨，這樣形成的中共政權，其首先要出現的弊端，是吉拉斯所謂的「新階級」之必然產生，因爲「黨造成階級，但階級因此而成長，並以黨作爲一個基礎」，他們認爲「全國的財貨爲己有，甚至認爲『社會主義的』、『社會的』或『國家的』財產等名詞，不過是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⑩。不止如此，中共的「新階級」們，還背負著其他共產國家所沒有的傳統專政獨裁的惡習，他們爲鞏固自己地位與利益，而展開兇殘的鬥爭，敗的一方，固然充滿挫折感，勝的一方，亦每因其疏於知性方面的培養與理性方面的提升，而有嚴重的墮落感。中共現在正運用著三千多萬的黨員，緊緊控制著大陸人民，這些「職業革命家」們却腐化至此地步，尤其經過文革的重大打擊之後，把一部分本來忠心耿耿的中共幹部鬥倒、整掉，使其他的幹部，有如驚弓之鳥，因此，明哲保身、畏縮不前，不敢放胆的說、放手地做，便成中共幹部的普遍現象。這又是造成當前中共危機的一大根源。

因此，中共可以說是以共產主義思想與制度的本質，引發其當前的危機；而當前的危機，又更加暴露了共產主義思想與制度的嚴重缺陷，這是一個惡性的歷史循環，中共目前正處於「緩變不濟、急變則亂、不變則亡」的歷史困局中，此種處境與中國前途之關係如何？請試論之如左：

參、中共危機與中國前途

我們要正視三十二年來國家分裂的事實，中共目前雖然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內外遭逢重重的危機，但它却依然竊據、統治著中國絕大部分的領土與人民，因此，它的危機固然將導至中共偽政權的覆滅，然又何嘗不嚴重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前途呢！

一、漢奸冒進性格招致民族生存危機

中共的本質既是俄共假國際主義之名，行以華上華下之實的漢奸工具，在羽翼漸豐之際，却又與其「蘇聯老大哥」為爭奪共產世界領導權而決裂、對峙，現在招致俄共以「討伐叛逆」的姿態，陳兵百萬在邊界，美國又想利用其戰略地位與力量，以牽制蘇俄對西方的壓力，而中共還沉醉在其「人民戰爭」的舊夢裏，妄圖以中國大陸廣大的土地與衆多的人口，做為發動核戰的本錢，其對民族生存發展所形成的危機，實在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嚴重。又因為其侵略的性格，在亞、非、拉丁各國大肆滲透、顛覆，定要搞得天下大亂，才想火中取粟，其帶給全世界人類的威脅，亦是空前的。

二、文化專制主義阻撓中國文化發展

共產主義是一種文化的極端主義，它透過共產黨專政後，必然表現為文化專制主義。就中共言，「文化專制主義不僅僅是四人幫時期才有的，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時，毛澤東宣佈『一面倒』，就為文化專制主義開了道路」^①，三十二年來，中共在文化上，始終堅持馬列掛帥，扭曲了中國歷史，支解了中國文化，對於建立現代化中國而言，不止交了白卷，並且帶來後患無窮，因為，共產主義的遺毒，已經無孔不入地污染了每一個文化的層面，使現代中國的文化發展，遇到極難克服的障礙，這對中國前途的影響是鉅大而深遠的。

三、獨裁專制斷送中國民主政治前途

中共的所謂「新民主主義」或「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皆是獨裁專制。本來俄共就是在「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兩件神聖外衣下，把歐洲中古時代一切黑暗的東西復活其來，而賦以共黨黨員以主宰人民的絕對力量；中共師承之，但毛澤東「還不滿意這個按照斯大林主義模式建立起來的黨和國家已經達到的專制程度和集權程度，他要求更加專制和更加集權」^②，由毛澤東所建造與糟蹋的中共匪黨，在他死後，雖曾演出一幕「審判四人幫」的假法治醜劇，但反而把內部的衝突引導至最火爆的局面，此對全中國的民主政治前途言，無異是致命的打擊。中國近百年來的政治發展史，可說是一部民主與獨裁交互拼鬥的過程，因為民主政治在中國是新生事物，所以，它曾遭到各種挫折，而以中共的竊據大陸、肆行暴政為最大，使中國大陸人民在短期內勢不可能享受到民主政治的福祉與利益，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將更為坎坷艱辛。

四、封閉社會妨礙中國現代社會的開創

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原為追求一開放性的現代社會，使全中國人民皆能生活在其中，享受生命的美滿。不料，中共數十年來，既以破壞中國傳統社會形貌與價值體系為能事，對一切美好的傳統事物，務必毀之以為快，然又提不出一套真正可行的新的社會藍圖出來，供人

民有所遵循；祇是不斷在進行各種運動，以疲勞轟炸的方式，無盡止地摧毀中國社會的元氣。再透過政治的高壓統治，將中國社會造成比傳統更封建、更閉鎖的落伍形態，這個社會成員，既不得了解該社會外的世界之一切變動，對其本身之社會實況，竟亦不得有所真確的認識；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除了歌功頌德以求配合馬列教條之外，幾一無所有，這樣的社會，可說其一切自我運轉、革新的功能皆已消失，對於企望有一開放、現代社會做為生活空間的中國人民言，實在是反其道而行，而中國社會倘不能從封建、閉鎖的形態趕快轉化至開放、自由的形態，則中國民族的前途，終無法大放光明。

五、奴隸式的經濟延宕中國物質文明的進步

中國近代之所以積弱，其主要原因在物質文明的落後，開創中國的前途，雖然千端萬緒，但最重要在解放國民生產力，以提高我們物質文明的水準，所以，國父以為：「建設之首要在民生」^①，但反觀中共對於經濟建設方面的結果，由於經濟思想與體制根本上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再加上人謀不臧，終於形成當前經濟上的諸多困難，可知中共所作所為，並非如其所宣傳，已經實踐了三民主義；而由於經濟上的「貧而不均」，使十億大陸人民依然生活在饑餓邊緣，不知要何年何月才可以享受到「均富」生活的理想。經濟上倘沒有能力徹底現代化，即是延宕中國物質文明之進步，而將使中國永遠處於落後國家之林，這是中共危機對中國前途的另一嚴重打擊。

肆、如何化解中共的危機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即中共目前確已遭逢嚴重危機，而這些危機若不予以解決，則終將危害到中國的前途，然則，要如何化解這些危機呢？必須從下列各點著手：

一、跳出共產主義的框框外去想問題

數十年來的極權統治，使中國大陸人民變成單線思考的動物，他們不敢跨出共產主義的框框去想問題。然而，共產主義既是一封閉性的黃昏意識形態，要解決它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倘不在知識上超越它的藩籬，而祇在其範圍內打轉，將永遠是一條死巷。中共現在正遭遇此問題。他們一方面知道共產主義行不通，但鑑於現實利害，又不敢從共產主義的框框外去想問題，所以，鄧小平有「四個堅持」之主張；但「四個堅持」除了重新束縛已漸次開放的民智外，對現實問題根本無任何解決之效用。我們要化解中共的危機，第一件事必先要做到從共產主義的框框外去想問題，才能根據中國社會的客觀需要，擬定出妥善的辦法來；這是以事實為制訂政策的根據，不是以教條為制訂

政策之根據。

二、從倫理人性的立場維持民族獨立統一

中國自古即爲一獨立統一之民族，維持它獨立、統一的最大力量，在其悠久深厚的人性倫理基礎，若抽掉倫理人性，中國社會馬上面臨自我解組的危機；又歷來中國也會受邊界少數民族的入侵甚至統治，但都憑藉其深厚的文化道德傳統，予以吸收同化，終於形成今日的中華民族。但中共在思想意理上既堅持以俄爲師，則其文化上之漢奸本質，已昭然可見；其統治大陸之後，更致力以外來文化破壞中國文化傳統，所幸中國文化精神已深植中國人民靈魂深處，故雖經文化大革命之慘烈摧毀，中國社會組織與價值觀念，尙不至爲其全盤瓦解，但其漢奸本質所引來的外患，却已日迫一日，因此，要化解此一民族內、外的雙重危機，惟有從速肯定我們文化傳統中倫理、人性思想的價值，並以此來安排中國的社會秩序，以結合中國的民族力量，藉維持我們民族的獨立與統一。

三、從民主法治的立場確保人民權益

廿世紀的政治潮流，是以自由、法治爲基礎的民主政治，惟有法治能產生民主、保障自由，故法治主義又是當代政治的特色之一。中共最缺乏民主法治，誠如陳獨秀所言：「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祇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在這樣的政治之下，不止使中共吃了無法無天的大虧，更糟糕的是，人民的權益毫無保障。要化解這方面的危機，便應從民主、法治精神的培育開始，以求遵循一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使人民的各種權益，得到確實的保障，然後可促進人民對國家事務的參予感，以發揮群策群力的效果。

四、從科學均富的立場徹底改善人民生活

人民生活包含精神、物質兩個主要領域，兩者之間互爲作用與影響，並無法像共產主義者那麼簡單地以二分法將之絕然劃分。任何一種主義，倘若不能有效解決人民之生活問題，皆爲一不切實用之空談。馬克斯雖自詡其思想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然就中共實踐的結果言，却證明爲不科學的幻想。要解決由此一不科學的幻想所帶來的經濟危機，我們要以科學方法來提高國民經濟的生產力，也就是以科學精確的性質，做爲規劃經濟建設的基礎，並以現代科技的能力來從事經濟建設。然對於分配、所得與消費等方面，則需透過「均富」的原則來進行，務使經濟建設的成果，能爲全部參予貢獻者平等共享，不再爲少數特權所專享。因此，科學的方法與均富的原則，即是化解中共經濟危機以求徹底改善人民生活的良方。

總而言之，必需以這四點爲前提，才得有效化解中共所面臨的一切危機，若忽略了其中任何一項，皆不足以成其全功。

伍、中共真正的出路何在

化解了中共的危機，並不表示即有效地解決了中共問題，要知道，中共問題是國際間所謂「中國問題」之核心，解決中國問題的先決條件，即解決中共問題，而解決中共問題，必需爲其謀求真正的出路。進一步講，替中共謀出路，必須有助於中國問題之解決，也就是要在中國前途的大方向上，才能找尋到中共真正的出路。經過三十二年的分裂與對抗，中國前途的大方向，大體上已經清楚地浮現出來，這可從「台灣經驗」上瞧出端倪。

「台灣經驗」指的是：中華民國政府自民國三十八年播遷來台之後，一切政、經、文教建設之總成果，它的特點首在堅持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的立場，積極從事國際事務的參與，雖在對外關係上，有過一時的挫折，但由此所建立的實質關係，却無遠弗屆，並且，爲國家、民族樹立一完整的新形象，此與中共之漢奸政權絕然不同。其次則致力於民主政治的推展，從學校的民主政治教育到歷年所舉辦的各級選舉，充份開拓了民主政治發展的光明大道。第三是在大力推行經濟建設，尤其是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能兼顧成長與穩定、求富與平均，創造了台灣經濟的奇跡。至於其他社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設，亦皆有具體可觀的成果，這便使「台灣的經驗具有了超越台灣本身的意義，亦即它有成爲整個中國發展模式的潛能」●，這也就是中國前途的大方向之所在。

「台灣經驗」對中共有相當誘惑性，故中共先有「經濟學台灣」之說，繼則在粵、閩沿海設「經濟特區」，積極謀求引進外資與技術，以改善工業結構，提高出口能力與品質，凡此，皆爲「台灣經驗」的誘惑性之表現。但中共畢竟不敢全部學「台灣經驗」，譬如對所得制度、經濟型態等，依然是老樣子，其他政治、社會、文教方面更不敢學習「台灣經驗」。而它又有「四川經驗」與「羅南經驗」，事實上，此兩種經驗，不過是向「台灣經驗」逐漸修正與認同的二手貨罷了；爲什麼中共不敢正面學「台灣經驗」以謀求其真正出路呢？因爲這樣勢必妨害到「新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故乃不惜犧牲全民族之前途，而一心爲鞏固其非法政權。這是中共最可惡的地方。

要如何避免中共再開歷史的倒車，而增加中國大陸人民的苦難呢？爲中國前途計，中共的真正出路在於：

一、趕快丟棄共產主義的臭汗衫

共產主義既屢經試驗，證明其爲行不通的幻想，即就中共目前所要學習的南斯拉夫而言，也在各方面現出危機，如經濟方面的通貨膨脹率是歐洲最高的，巨額的外債已達二百多億美金，並且失業率也是歐洲最高的，一九七九年達百分之十二。再就年來鬧工潮、爭自由最

厲害的波蘭言，其在政治、經濟、國防上所呈現出來的危機，還不值得中共警惕嗎？「自十九世紀以來，東西方高級知識分子——包括馬克斯和恩格斯——所談的共產主義原是一大謊言。而自十九世紀以來，東西各國所推行的共產主義社會原是一大騙局」⁽¹⁶⁾，既然如此，還不趕快丟棄這件臭汗衫！

二、回復中國人立場化危機為轉機

經過共產主義洗腦數十年的中國大陸，一旦丟棄共產主義之後，可能會陷入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如何跨過此虛無主義的陷阱呢？必須在文化上認同、回復中國人之立場，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才能正確地處理國際事務，才能真正為中國人民創造福祉。印度總理甘地夫人說得好：「我們既不親俄，也不親美，我們只親印度」，中共幹部們如有此認識與氣概，則不難在排除馬列陰影之後，使民族的力量大為凝結，從而化中共之危機為中華民族之轉機。

三、確實發展教育文化以培養民族創造力

一個民族的創造力之強弱，決定其民族地位之興衰，而民族創造力的強弱，端視其教育、文化發展的程度而定。目前中國文化在大陸上「喪失了自己的原則性，自己決定方向的特性，不能作為生活的原則；生活的原則是馬克斯、共產主義所決定的」⁽¹⁷⁾，這就是文化上的「外化」與「自亡」，因此，共產中國就不可能發展出適合中國人民生存、生活需要的文化模式來。中共若真想為中國謀出路，以建設一現代化的富強國家，則應該從培養民族創造力下手，全面恢復、增進教育、文化的建設，以開創一個適合中國民族生存、發展與人類前途之所繫的文化體系，這是中共出路的第三點。

四、研訂切合中國需要的政經法律制度

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在於制定一套公平、公開、合理的客觀制度，做為全體人民共同遵守的生活規範，因此，各種法律制度的研訂，便直接關係到民主政治能否落實的問題。而每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歷史背景與社會條件皆不相同，所以，同樣是實行民主政治，可以取法各異，要之以能否貫徹主權在民、民意統治的精神為標準。而現代社會、經濟的急遽變革，使人民對各種法律的依賴程度日增，因此，不要說中共無法無天的狀況早該摒除，即使在有法有天下，也迫切要研訂一整套切合中國需要的政經法律制度，如此，才能有效促進社會的分工與合作，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必有很大的貢獻。

五、有效開發中國富源並求合理分配

中國人口密度雖嫌略高，然中國大陸所蘊含的各種自然富源，實在非常豐富，這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最大憑藉。中共必須實

行計劃的自由經濟，提高生產誘因，鼓勵人民從事生產，並改善其所得制度，保障人民的私有財產；更要防止「在政社合一中獨攬了全部大權的社隊幹部把集體財產變成了他們的私有財產，把農民變成了依附於他們的新式農奴」^⑩，所以，解散人民公社，實行耕者有其田，也是開發中國農業資源的好辦法。至於合理的分配，即在廢除階級劃分的辦法，使人人平等，皆得發揮其力量，以追求美好的生活；而寓私利於公利之間，使兩相調合，達到合理分配的理想。祇有生產、分配、消費三者皆得良好之解決，始得大開中國之富源，且以此大開之富源，改善人民之食、衣、住、行、育、樂諸問題，登人民生活於極樂之境。

以上所論各點，是中共真正的出路之所在。

結 語

中共現在揚言要熱烈慶祝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紀念，站在中國人立場，我們歡迎它；但我們要提醒中共：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在於孫中山先生要以三民主義做爲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工具，因此，紀念辛亥革命，是要接受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遺教，做爲統一中國的根據。中共雖曾變造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爲所謂的「新三民主義」，並謊稱已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但我們觀察中共目前所面臨的危機，却駭然地發現：原來中共之所以出現這些危機，全是因爲違反三民主義而行的結果。

大陸人民已經呼籲道：「迎接三民主義歷經三十載滄桑重回『萬紫千紅總是春』的祖國，期待創新的中國國民黨把孫中山先生的偉大理想，帶回給十億中華民族的心海裏」^⑪，三民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常道之所在，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雖然千折百回，終究要以三民主義爲其最後歸趨。

中共的危機，既出於違反三民主義而生，則其出路必將趨向三民主義。從三民主義的立場，統觀本文所論各節，即知這是中共唯一的出路之所在，亦是中華民族化危機爲轉機的關鍵之所在。（民國七十年六月一日）

注 釋

- ①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六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一版。
- ② 陳裕清：『地緣政治的自我陶醉』(台北，中央日報第二版，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 ③ 金耀基：『中共現代化與思想信念的危機』(台北，時報雜誌，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九日，第六十九期)。
- ④ 白樺：『沒有勇氣就沒有突破，沒有突破就沒有文學』(台北，中華雜誌，民國七十年五月，第十九卷第二四期)。
- ⑤ 荀子：『天論』，見梁啟雄：『荀子東釋』(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二年三月)第三三五頁。
- ⑥ 金耀基：『台灣海峽兩岸意理的「對立」與「統一」』(台北，聯合報第二版，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 ⑦ 鄭學稼：『中共興亡史』(台北，中華雜誌社出版，民國六十八年一月)，第二卷一〇〇六頁。
- ⑧ 魏京生：『自傳』(台北，中國時報第三版，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 ⑨ 余英時：『毛澤東的歷史位置』(台北：「人權論壇」，民國七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 ⑩ 吉拉斯著中央日報譯：『新階級——共產制度的分析』(台北，中央日報社出版，民國六十八年六月)，第五十八、八十五頁。
- ⑪ 姜新立：『中國大陸馬列主義文化層面的評估』(台北，救國團編「放眼神州」第三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
- ⑫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台北，「聯合報」第三版，民國七十年五月十六日)。
- ⑬ 國父 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國父全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民國六十二年六月)，第一冊第七五一頁。
- ⑭ 陳獨秀：『我的根本意見』，引自同註①。
- ⑮ 金耀基：『走歷史常道，開時代契機』(台北，「中國時報」第二版，民國七十年三月廿八日)。
- ⑯ 程石泉：『波蘭大亂刺』(台北，「中央日報」第十版，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廿日)。
- ⑰ 牟宗三：『中國文化的斷續問題』(台北，「聯合報」副刊，民國六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 ⑱ 同註⑯。
- ⑲ 北平地下刊物「求知」：『三民主義、國民黨與中國』，引自「廿一世紀」雜誌(台北，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出版)。